

主題 | 「沒有歷史的人」論壇－不被允許長大的紅葉少棒

時間 | 2019 年 11 月 1 日(週五)09:30-16:50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講堂

主持人 | 吳誠文

與談人 | 謝仕淵、邱聖德

主辦單位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合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

謝仕淵：在進入這論壇之前，我們邀請到幾位貴賓，就學校或文學院的角度來談我們這次的行動、論壇的意義。這次論壇叫沒有歷史的人，是尋找公義的歷史之路，什麼叫沒有歷史的人？我等一下還有機會跟大家說，簡單地說，就是我們想要去關切過去我們各種回顧歷史的框架下，沒被寫進歷史的這群人跟這些不同的議題。這樣的概念之下，發展這四個題目其實都有後續的行動可以相互對應起來。這議題包括現在台北也有很多人關注的樂生的議題，然後棒球的議題、二戰亡故於南洋的兵與他們的家人，以及過去很少人知道的外省人白恐的議題。這件事其實是以事件來著手，背後反映台灣社會某一種問題。譬如說討論紅葉少棒，背後的問題是整個台灣棒球界的問題，我們是帶著這樣重聲的提問以及社會實踐的可能。

首先歡迎吳誠文副校長，他是今天紅葉少棒議題最直接的相關人，第一場討論紅葉少棒，緊接著紅葉少棒三年後，1970 年之後的巨人少棒的一員，他現在是我們成功大學的副校長吳誠文老師、教授，先請他來說幾句話。

吳誠文：感謝謝老師用心地籌劃跟舉辦這次的活動，也很高興有機會來跟大家談一談這個紅葉少棒背後不為人知的事情，及其代表的重大的意義。我看到這個主題是「被歷史遺忘的人」，就在想如果被歷史遺忘，大家都不知道的話，為什麼要談這些？當你知道了後，慢慢去研究它，你會發現這些人，可能他的生命從過去到現在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是應該要被談的，而不是永遠忘掉。談到棒球這個主題，今年我到成大來之前，有機會讀謝教授《棒球一百年歷史》，他書裡講的一些觀點跟過去在寫棒球史都不一樣，我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鈴木一郎，他在剛結束的這個球季於東京巨蛋隱退了。去年他創造一個紀錄是在美國大聯盟，超過三分之二的安打，是非常偉大的成就，但美國人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是刻意忽略掉他在日本職棒的貢獻，所以對他是很不公平的。廣大的球迷因為現在資訊很發達而不會把這個東西忽略掉的，可是為什麼在美國的棒球界，他們還是刻意不報導那些東西？他的偉大的貢獻還是真實的，而

鈴木一朗這個不是真實的。他以前不是在大聯盟，以前的紀錄雖在，可是日本職棒水準是比較低的，他們用這種觀感來看。

回過頭來看棒球的時候，我讀了謝教授的書才去想說，當我們在打球的時候，我就是打球而已，但其實那個年代是刻意把它塑造成為國爭光這種精神，就如同四處可見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標語，由政府單位決定要怎麼看待這件事情。今天回談起來，台灣體育界把它叫體育界這是不對的，因為所有的單項協會還受政府在掌控。曾經有一個解釋機會是在呼籲政府要正視這個，運動如果完全靠政府在支持的話，運動的水準是不可能做得更好。美國任何國手的選拔政府是從來不干預的，這對整個台灣的運動水準或是整個社會文化的改變，是關係非常大的，如果大家不去探討，就會延續過去那種觀念。大家都在講，為什麼我們的國手在今年賽就被打掉了？這種事情一再發生，背後就是很多國安與政治的問題，造成很多好球員進不到壘球板上，無法好好栽培等等。我很佩服謝教授這幾年花很大的力氣，來探討各種社會議題，棒球只是一個例子。這些議題對我們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也非常重要，可惜長期被忽略。我也非常感謝各位能關注這個議題，歡迎大家到成大來，希望成大成為我們國內標竿的學校，來把這個議題擴散，讓全體國民社會關注，謝謝大家。

謝仕淵：謝謝吳副校長。這幾年我們一直在推動文學院的學生、老師跟社會做互動，透過社會實踐，包括踏溯台南的行動，本身其實反映我們對人文知識在時間上的不同想像跟可能。在這個事情推動當中，一個很大的推手就是陳玉女教授，也是文學院的教授、院長，請院長來跟我們說幾句。

陳玉女：今天的定調是「沒有歷史的人」，在歷史學裡面，運動史確實如吳副所說的，在我們學術界裡面還是非常少看見的聲音。「沒有歷史的人」在歐洲十九世紀初、二十世紀初的時候，他們那時候提出一個觀點就是「無歷史之名」，強調所謂由下而上的歷史。從那時起，開始有知識份子在反思，所有的歷史幾乎就是統治者的歷史、主流歷史的歷史，但推動歷史前進的、更大部分的百分之九十的人，他們的聲音在哪裡？中國五四運動的時候也開始去反思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到今天，是不是推動大家持續在關心「沒有歷史的人」的歷史，這仍然要很深地去檢討。

今天提出四個議題，來不及長大的所謂紅葉少棒，我還沒進入小學甚至進小學之後，我們在瘋棒球，現在講台灣三月瘋媽祖，就是類似的瘋狂狀況。少棒隊出去國外比賽，然後得到世界冠軍，棒球變成全民運動。可是確實經過這三四十年的發展，我們的運動還是有發展上很大困境。我兒子學體育的，一直到現在他在西班牙還是學體育，過程中有很多煎熬，畢竟這個不是社會主流，當你的小孩去學體育時會被質疑，甚至他們曾被老師說：我是來拯救你們這群沒

有用的人。這也許可以呼應一下剛剛吳副校長所說的，整個體制上一樣是一種政權的掌控大過實質上體育的自由發揮，所以很多有才華能力的人沒辦法在檯面上，這點思考很多面向。

先前文學院、藝術中心跟博物館，從十月開始有一個台南國際人權藝術節，有系列的活動，10月4號到6號有記憶人權跟戲劇，透過不同路徑去展現人權議題。今天是研討會的方式，在這個議題當中，我曾在記者會講了一個一般人不會注意的小故事。那個故事是透過台文系的系主任陳玉峯老師所知，他將一位獄中囚犯的心堆疊成一篇「阿賢的故事」，阿賢現在五十幾歲，可是有三分之二的人生都在獄中度过。他最大的轉捩點是小學的時候，講台語結果被吊了狗牌，之後他不敢講話，他覺得他講話是有問題的。人生受到挫折之後，他用無言來抗議整個政體，後來因為對體制沒信心，國中也畢不了業，之後接觸的世界更朝向非主流社會，接觸幫派、賭場等等。事實上也不是他偷別人東西，但警察為了要業績，就把他抓來，羅織一些罪名把他逮捕入獄，大家認為他就是幫派份子，這個罪就是他應得的。

這樣的故事是說，這種人權的議題不是什麼人也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每個人要關心，在生活裡面我們必須要尊重別人，不能因為我們的主流而駕馭到非主流或被認為比較微弱的勢力，因為這個過程會產生暴力者，我們有時候是暴力者而不自知。而主權社會跟非主權社會之間，怎樣更有效地讓大家都可以發聲，今天這樣的活動內容其實是有意思的。包括外省人白色恐怖，一般白恐，我們都認為是本省人所遭遇的。之前在台文館有「一九四九年的逆旅」展覽，外省人士在那個過程中其實受到很大的傷害，那個聲音透過展示，非常感動，搭配西方猶太人被納粹迫害，展示當安妮遇到阿嬤的時候是什麼狀況，那是非常經典的故事。為什麼剛剛提到踏溯，踏溯是希望同學教室外的知識大家要關心，讓每個教育者能夠提供更多可能性給同學，跟學校以外的人士能夠分享，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場研討會，他可以提供這樣的題材，也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人權正義的問題。謝謝。

謝仕淵：我來說明一下這次論壇題旨的規劃，為什麼只有這四個議題，畢竟這個概念之下可以討論的問題很多，我們今天先選擇四個，但是這四個議題除了透過論壇的形式還會是什麼？我們做歷史研究清楚知道，現在議論的議題跟材料都是選擇的結果。當然基於不同因素，提到一些被排除在這個書寫系統外的素材，這些議題顯然在今天而言，或大或小、或深或淺影響到當代不同社會議題的討論。此次論壇從外省人白色恐怖、樂生院的問題、紅葉少棒以及亡故南洋的那些遺族，來談不同歷史議題對台灣產生的影響。我們長時間對這些不同議題的觀點跟看法，它有所影響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產生很深刻的作用以及在社會上的力量。

我們要處理關於歷史知識如何產生一種社會實踐的可能，背後的目的除了探求社會公義的問題，也使歷史知識、人文研究有了新的可能；作為學術的對話，對學校而言，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課題。在這課題之外，研究的行動或者因為這些知識為基礎所延伸出來的社會行動，還有什麼樣的可能？這個問題與題旨，就如同論壇的副標「邁向公義的歷史之路」，討論過去的例子，跟我們當代面會社會正義問題的關聯性到底是什麼？我認為，是對過去的探索更完整、清楚，並在當代蓄積更多力量，然後去延伸不同社會行動產生各種動能，這絕對有關聯性的。這整個論壇或「沒有歷史的人」的概念是要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要跟大家說明的是，這系列論壇的對話，不僅關係到我們對人文社會的想像跟社會實踐的可能性，也有後面的可能性。我們在這件事的規劃，論壇是一種形式而已，他可能透過出版、展覽，與不同的行動者彼此串連跟支援。他有更多可能讓這個議題跟社會之間的溝通，達到我們預期所想像的目的。今天 11 月 1 號這個論壇之後，十一月底的時候會在成大博物館，針對今天論壇提到的外省人白恐議題有展覽跟成果。這個議題關係到山東流亡學生，今天下午第一場會談到。關於外省人白恐，這個行動串連成大歷史系的學生跟來自澎湖的高中老師、高中學生合作，已經做了三次工作坊。我們要對這個議題有些整理，那個目的就如同剛剛說的，透過與不同的人對話，把這個議題重新梳理，讓更多人了解。

透過展覽的形式，我們十一、十二月的時候會到台東延平鄉，進行兩次四天的工作。剛才跟吳副校長提到少棒館^N，那個紀念館他也去過，我們發現它只談了 1968 年那群孩子，他們很多人也已經往生，整個社會對這個事情的關注跟作用力，對他們人生產生的影響，有很多時候撕裂得很嚴重，等一下我跟邱老師會談這個問題。當然我們似乎只看見他充滿光環的一面，一如我們現在期待我們的棒球，其實沒什麼改變。而這個議題要拉出的是整個五十年來的棒球問題，我們會透過台東女中、成大學生、延平鄉的朋友協助，先把文物館的博物館制建立起來，重新談這個館所需的觀點，我們可以一起討論、共同參與。昨天聽邱老師說這個館有新的可能，而這個新的可能，可不可以有新的觀點？這是我們所期待的，總而言之簡單談一下，行動的整個過程，當然還有更多可能，只是說我們今年踏出第一步做這件事情，明年會依序在這樣的路上繼續前進。

也感謝不同議題的專家學者來參與我們的與談，然後同學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起來參與、完成這個議題。像剛剛吳副校長所說的，希望這樣的行動可以建立成大在人文知識實踐上的一個標竿，我覺得這很重要。這個價值回到最素樸的，人文知識之於社會之間關係到底是什麼？基於研究對話，這個很重要，但是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我們嘗試的事情。

吳誠文：剛剛謝教授已經把整個計畫都講得很清楚，這場討論的是紅葉少棒，年輕的朋友們大概不知道那個情形，所以請謝教授講清楚來龍去脈，等一下就有機會來討論這個現象代表是什麼意義。我們也特別請邱聖德先生，他父親當年就是紅葉少棒隊的隊員，所以他從小也耳濡目染。雖然他父親在打球的時候他還沒出生，但在這個家庭、紅葉村長大，他對當地的狀況也非常了解，所以等謝老師講完後，邱聖德先生也會跟大家談一下，從他的觀點來看這個事情背後的狀況以及後來的發展，我們先請謝老師。

謝仕淵：謝謝吳副校長跟邱老師，邱老師特別從台東上來，然後兩點就要再趕回去，所以我們第一場安排就是先談紅葉少棒。我跟邱老師之間的討論是，我先大背景的鋪陳，我蠻好奇大家有聽過紅葉少棒嗎？到現在還有人感覺紅葉少棒擊敗的是世界冠軍嗎？我今天就來談談那件事情本身跟我們以為的紅葉少棒擊敗世界冠軍這個事情怎麼發生的？這個是我們追逐為國爭光的棒球的原型，表面上的問題很容易談，但為國爭光背後的代價我們付出了什麼？這個是我跟邱老師試圖說的，那些光明的、開心、勝利的故事，沒必要一直說，問題是藏在背後的是什麼？大家付出什麼代價？

今天談的議題是我這幾年一直關心的議題：紅葉少棒，紅葉少棒談的是整個棒球的制度跟價值這五十年來的問題。取這個名字：不被允許長大的紅葉少棒，其實是因為我在幾年前，在紅葉的研究當中，邱老師的論文是最能夠觸動我的。他站在那個位置的觀察，跟他身邊長者們的生命史的書寫，那個故事的另一面完全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樣，等一下邱老師會說。所以我今天要來談的就是，棒球怎麼會沒有歷史？棒球每個人都熟悉，很多人都關心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說的是，為什麼另外一個版本我們會不知道，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談不被允許長大的紅葉少棒。

紅葉少棒是 1968 年這件事情在如果台灣的棒球史，若要做一些分期的話，這件事情絕對是具有意義的里程碑：一隻來自於台東偏鄉原住民，那時候幾乎一切所有台灣「匱乏」的代名詞的一支紅葉少棒隊，竟然打敗了台灣長久以來在棒球場上，幾乎不能取勝的對手：日本。大家可以知道這個反差，不只是紅葉本身的條件這樣子，還有那個對手。對 1968 年活在那時候的人而言，從 1920、30 年代以來，台灣跟日本的在球場上對抗，最後的結果出乎所料。

當然裡面有很多細節，例如比賽用球都不是日本所習慣，這個我們就不談，但最後結果的社會效益產生了，因為贏了。就一般球迷而言，他看到的就是贏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左右兩張（照片）是一個來自部落的紅葉國小，當他 1968 年 8 月擊敗日本對手，變成全民的英雄。這種平民英雄的想像最容易觸動我們大家，你知道嗎？什麼叫平民英雄，就是他沒有完成這件事情之前他都跟我們一

樣，但他有一天做到了，因此產生很強的作用力：那個人有一天會是我。吳副校長跟他們前一代或 1920、30 年代，投身棒球運動的嘉農的球員們，背後的心態也是如此，那個人可能是你平常在國小會遇到的，可能假以時日我們也做到這件事情。一個棒球平民英雄的想像，觸動了許多人「有一天或許我也可以」的想法，這個情形是台灣棒球很重要的分水嶺。現在來談談到底之前發生什麼事情，為什麼會覺得這個事情所產生的效應跟社會的動能這麼強大？

棒球在 1920、30 年代在台灣普及，但是對台灣而言，有兩件事情意義重大。隨著台灣近代國家化成為一個整體的時候，「台灣隊」產生了。台灣要去日本打，必須要有台灣隊，就像台灣作為一個主體群體的概念，在棒球這件事上面，特別是要去打甲子園要選出台灣代表隊，這個事情已經在 30 年代發生，也就是一支代表台灣的隊伍。從 1930 年代開始發生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成員比較多台灣人跟原住民的嘉農隊得到很好的成績。這當然就產生很強烈的激盪，原來經由棒球可以去改變或者平衡，台灣作為殖民地處境所遇到的一些問題，所以大家是從這件事情當中找到了代償，這與後來的金龍棒球代表台灣可以有些不一樣。可是到了戰後，整個台灣棒球技術的餵養，跟日本關係很密切，日本的姿態其實就如同所有的前殖民地到了後殖民時期所遭遇的一樣，台灣既想擊敗過去殖民他的人，但是又覺得非常困難，因為他們所有會的東西，都是日本教給我的，他教你打球、示範最精湛的技術，他有最豐沛的這些球具的物質文化。

到了戰後這個事情存在著嗎？繼續存在著。為什麼？因為我們台灣跟日本整個棒球的網路有一個民間的社群，裡面都是銀行界，也就是謝國城他們那輩的人，他們串連了跟日本棒球界的關係，所以我們在戰後不斷持續以日本棒球作為一個指導者角色的狀況。但很麻煩的問題是，臺灣棒球繼續接受日本棒球的指導的同時，台灣跟日本又各是一個國家，所以他們會在亞洲盃碰上，每一年都會有一次國與國的遭遇。也就是台灣球界的人依舊崇慕前殖民者在這個領域的成就，但是又要在球場上擊敗對方，情緒非常複雜。我訪問很多人都說，他覺得當然穿上那身球衣，不管是 1950 年代初期的台灣，或者是 1950 年代中期之後開始寫中華民國等等，他們遇上日本的時候當然想贏，但心理上都覺得很難。這種矛盾的情緒一直都在反映了我剛剛所說的，戰後台灣在東亞體育世界上最強勁的對手，就是以前統治過台灣五十年的日本。從 1930 年代開始，台灣隊的意識，視日本為強勁對手，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幾十年沒什麼太大改變。

但是 1968 年這個事情有些改變了，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紅葉擊敗關西聯隊，和歌山跟幾個附近的學後組成的一個聯隊。他當然不是世界冠軍，我們那時候不知道這件事情，媒體也有點裝糊塗，這件事是 1968 年 8 月 25 日這一天，很關

鍵性的事件，最後結果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以七比零懸殊地贏了日本隊。對照先前的狀況，到這個階段這件事的發生，其實觸動更多人，紅葉幫我們做到這四十年來不曾做到的事情。於是很多討論中華民國棒球史的論述，就會把紅葉當成一個很重要的起點。特別是 80 年代，還沒辦法去處理日本時代那一段歷史的時候，很多人覺得台灣的棒球不是從紅葉開始的嗎？他們沒看見的是吳副校長你們在打球，而且其實台南市早從日本時代開始打到現在，每年那些國小之間早就很正常地在有校際間的比賽。紅葉的事情也是一樣，只是日後的詮釋把這件事情給戲劇化了。

總之 1968 年的紅葉少棒振奮了很多人，改變了我們因為經濟各方面還有外交危機心態的自卑，棒球熱潮給予很多台灣人自信，這個事情讓我覺得他開始有點不一樣了。但很有意思的是，事情發生的當下，所有媒體特別是體育版的記者，都知道紅葉擊敗的不是世界冠軍，他們很早就知道其實來的是關西的球隊。但因為後面局勢的發展，如果說出事實就會被大家認為很掃興，因為第一二版政治版已經定調擊敗世界冠軍了，第三、四版的體育版怎麼可能寫跟第一、二版不同的話？那樣的當下，就讓紅葉擊敗世界冠軍的說法醞釀開來了，也就是我們知道的「紅葉擊敗世界冠軍」。但更複雜的是，當年紅葉擊敗關西聯隊的時候，就受人檢舉紅葉內部的冒名頂替跟超齡的問題。超齡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早期比較晚報戶口，這個文化還蠻常在台灣發生的，鄉下很常可以一兩年之話再報。但這個事情一旦變成正式比賽，因為比賽有秩序、有規範，確實在這個形式上就會牴觸那個規範，最後紅葉雖然其實擊敗了日本，但是相關的指控也讓這群紅葉少棒的孩子不好過，明明這些調度都是所謂大人的遊戲。才十二歲的孩子，就像吳副校長剛才所說的，怎麼會參與調度的安排，一上去就只是把球打好。因為這樣子，本來承諾他們的很多事情，出國比賽、集體升學的事情，一經放下就未再提起。

既然紅葉都能擊敗世界冠軍，為什麼我們不自己去美國就好？這就是為什麼隔一年，台灣的球隊會到美國去參加威廉波頓很重要的原因，其實是這個時間這件事的啟發，但受惠、參加的並不是紅葉這群球員。而每個世代對於銘刻或製作紅葉少棒擊敗世界冠軍的事蹟都不太一樣。80 年代有兩個比較大眾化形式的出版品，去形塑紅葉打敗世界冠軍事情，有關鍵性的影響。一個是賣了二十五萬套的漢聲小百科，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非常地可怕，賣了二十五萬套。漢聲小百科裡面很簡單，但它版本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紅葉少棒擊敗世界冠軍。另外有一部電影《紅葉小巨人》，1980 年代，1988 年的時候拍完在未來三十年一直到今天，只要你會在半夜看龍祥、東森電影台的，一年大概會重播七八次、十幾次。我請學生把過去二十年到底播了幾次做一個統計，我發現這三十年間太可怕了，這也是為什麼到現在我問大一通識的學生這個問題，有人寫問卷回到他看《紅葉小巨人》知道的。所以紅葉擊敗世界冠軍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多人還是知道？而且用刻板的想像來理解紅葉少棒，這其實有個 80 年代的機制形成，讓我們形塑這樣的認識。

總之 80 年代我們對這個事情的理解，就像我說的，紅葉少棒是永遠青春永駐。我現在有個學生其實是職棒選手，他說紅葉小巨人那首歌，其實就是 90 年代的台灣棒球國家代表隊的國歌，每個人都會唱，他們從裡面學習、相信很多事情。我們現在會唱的〈再出發〉其實是 2000 年之後，是這 20 年來國家隊的國歌。周思齊說他們上一代每個人都唱《紅葉小巨人》裡面那一首歌，裡面所說的對他們影響很大，他的教練還看到電影裡面紅葉是打廢輪胎，於是就跟著打廢輪胎，從小學紅葉來打球。我的意思是，80 年代有一個去銘刻紅葉記憶這種方式其實是更大眾化，讓更多人知道這個事情。

過去這半世紀以來，談台灣棒球的時候，紅葉是一個很重要的座標，70 年代最常出現的談法是，只要球隊打得好，成績好、拿到世界冠軍，常常會說印證了紅葉的光輝。但如果你打得不好就說想想紅葉，反正什麼話都可以讓紅葉再出來飄一次。我最近請學生蒐集各個縣市議會議員質詢稿的時候發現，他們怎麼拿紅葉當事蹟，很喜歡用此來質問各單位局，說我們很窮但你們為什麼都做不好？你們看看紅葉！所以邱老師可以跟你爸爸說紅葉影響很大，每個人已經把它當修辭或象徵，這件事本身也變成一種所謂在困苦中成長的克難精神代表，以致於過去五十年來，總統、副總統、台灣省主席跟行政院長，最常造訪的國小的畢業典禮就是紅葉國小。總統去參加誰的畢業典禮，講的話有也是象徵性的，那些講稿現在也都在總統府公開的資料當中，談的不就是紅葉是台灣一個怎樣的象徵。

由於這個事情對激勵社會有很強大的力量，所以事件之後，很多球迷不知道他們之後發生的事情。很多球迷一直捐款要讓紅葉站起，雖然那時候關注已經是巨人、七虎、金龍，甚至 70 年代中期，已經是青少棒，美和、華興成為舞台的主角。但是很強大的社會力量希望紅葉再起，譬如說有人去遊說臺東縣教育局應該要讓紅葉的孩子一起讀高中，直到他們成棒的時候。台東也有一個牧業的老闆告訴他們，你們來我這邊工作，一起來打球，叫做合力牧業。我的意思就是說，紅葉少棒的球員，他們的事件產生一個很強大的社會效應，在這個事情之後一直被期待再打球，不同的聲音一直進來。我讀資料時其實很感慨，你已經超過二十歲了，還有很多人跟你說我出錢給你打球，你們要恢復以前的光榮這樣子。我那時候去訪問邱老師的爸爸，他就說：「我的感覺就是難道我不打球不行嗎？」這個等一下邱老師會說，其實紅葉的球員在三十歲、四十歲，有很長的時間不大喜歡談這件事情，因為一談是要跟過去的自己和解。

所以我會覺得我對於這個議題的關心，我就簡單用這一頁來表達我的想法。一開始我們說他們超齡，之後又不允許他們長大，要他們繼續打球、為國爭光。台灣用自己的想像跟期待介入了這群紅葉小將的生命，然後把他們遺留在 1968 年，而如果把紅葉替換成我們對某某棒球的期待，是完全一樣的事情。所以我作為二十年來一直在關心棒球研究的人，其實我們在關心跟支持棒球的同時，對於棒球的任何發言壓力其實很大，我們的棒球體制怎麼會用奇怪的方式，熱情的球迷造成的善意反而壓力很大。我認識教育部跟棒球協會一些人，他們其實有時候會怕，這個如果出去再輸、他們都沒辦法睡。

我們世界棒球排名很前面都是學生棒球，都是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的成績很難排到前十名。其實都是孩子，我們孩子也沒有比日本跟美國多，到底要怎麼樣把小孩子訓練出去每次都能夠拿第一第二名？這很簡單，就是比別人訓練還更多就可以了。但這樣對嗎？所以我說紅葉少棒的故事不是五十年前的故事，現在依舊用為國爭光的理由，最合乎投資效益的手段，為什麼？最理想的狀況應該是全台灣依著各自的興趣在打球，但我們通常都沒有這樣，而且為了確保最後的成果，會用投資報酬率比較高的方法，把這群人集中在一起，可能從十二、十三歲就開始讓他們得到嚴格專業的訓練，大家覺得這樣對嗎？

我相信吳老師主張的是，應該要用一起玩的方式。很多人很年輕的時候就進入專業訓練的領域當中，這當中原住民其實又更多，因此棒球產生高度族群堆疊現象，結果我們最後就說原住民特別會打棒球，整個社會制度就這樣。當最後高度族群堆疊，我們就會繼續鼓勵原住民再進到這個系統。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這些來自原鄉的棒球好手，他們小學國中高中的同學，多都在工地裡做粗工。卑南、南王上次得到冠軍，有個紀錄片導演跟著他們十年，十年後世界冠軍的球員都在幹嘛？全部都在台東的工地裡當粗工。那一屆我覺得很特別，因為偶爾一兩個有機會，但是他們後來卻都在工地裡做很辛苦的工作。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藉著紅葉為題，他到底怎麼被我們所熟知，尤其反應我們過去這幾十年來台灣棒球的問題，我先分享到這邊，謝謝。

吳誠文：謝謝謝教授給大家一個背景的知識。我們請邱聖德老師來談一下，從他的觀點，因為他父親是實際上親身經歷過故事的主角。

邱聖德：副校長、謝教授，各位與會的來賓大家好。今天會來主要是因為之前謝教授有一天就突然到我家，我爸就說，有一個姓謝的老師找你。因為我那天還在學校上班，他有先去找我的父親，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鼎鼎有名的謝教授。當初在寫論文的時候為了搜集資料，都一定會看到謝教授相關的文章。剛剛謝教授已經做紅葉少棒背景的論述，我要講我論文的部分、鋪陳。其實當初我進入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我們所上大部分是處理原住民的議題，那時候進

去的時候我原本就設定我要寫棒球。我研究所念了五年還六年，我一邊修教程跟研究所，後來去考試，考上教師證、正式老師，但論文難產不想寫，有家庭壓力，跟公所一天到晚打電話叫我趕快去當兵。

後來我教授就問我要不要快點回來寫論文？我在台東縣泰源國中結束代理老師後，就回花蓮，租了一個小套房花了半年，加上先前做的資料搜集，特別針對紅葉少棒寫論文，原本是想處理國家認同問題。搜集文獻的時候發現臺灣寫棒球就分幾個層面，走技術類的，就寫投手的軌跡、揮棒速度，比較運動科學的層面。另一方面，則是國族認同做切入，還有一些歷史背景。後來我就想說，好像比較沒看見從球員部分做完整論述，包括他們到底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我研究教授國族認同太大。

口試沒有幾天就被抓去當兵了。我大概休息一個禮拜想說，既然前面有累積一些資料，再加上我跟這些長輩有些淵源，都是部落的長輩，趁他們還在的時候快做訪談。所以我這論文寫完畢業，大概十年了，我是 99 東華畢業，所以我的訪談會更早，這中間有些球員已經往生了，包含我當初訪問的球隊管理也已經往生。如果當初我沒有做的話，再下一個十年，這些球員包含我的父親應該都不在了，目前大概只剩下四五位。除了我父親在紅葉村，其他都在外縣市。我論文有引用一段蕭菊貞教授拍紅葉紀錄片時提到的心情，他去拍紅葉少棒的時候，越接近事實他很害怕，就是剛剛謝教授講的，會去打破大家對紅葉少棒民族英雄台灣棒球的發展，打破大家對紅葉長久以來的想像。我在寫論文的時候也是一樣，特別是在我的論文，有段特別處理冒名頂替的事件。我們紅葉出來幾乎都會打棒球，以前穿紅葉衣服是真的很光榮，有一年我們來台南比全省盃賽的時候，我們穿著紅葉走在台南街上，大概就是四五十歲的那種年紀，你就會聽到他們說紅葉紅葉，那時候還小也不知道他們認識我們，後來長大之後，隨著少棒紀念館的成立就慢慢了解。

我父親也不會跟我們談這段，包括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訪問其他球員我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反而是訪問我爸爸的時候，因為我們布農族傳統父親都是一號表情。我為了訪問他，坐在客廳一人一邊，想說要怎麼破冰呢？我跟父親感情很好，只是因為傳統父親跟孩子比較不會有什麼親密的互動，後來最好的方法就是買一瓶威士忌，請他聊一下紅葉少棒的東西。他一開始會排斥，說沒什麼好聊，你不是有在做研究？我說我想聽你自己講。隨著杯子一杯一杯開始打開了，我有東西可以寫了，大概就是這樣。

在做這個論文生命史研究的時候，處理到冒名頂替這部分，內心也有些糾結，包含現在在網路上只要搜尋紅葉的評論，像是之前紅葉少棒有做一系列五十年專題，很多人也是有在處理這個冒名頂替事件。早期從關注到冒名頂替到後

面，有一些轉變，大家開始慢慢注意這些球員他們後期的生涯，就是包含剛剛謝老師講的十幾個球員當中，三分之二，三十初頭就過世往生。我們去少棒館大家不會看紅葉怎麼樣，會被一個球員錄的生歿吸引，大家只會注意到他們現在剩幾個，比較少人會關心說這些球員怎麼了。為什麼將近三分之二的球員，包含教練這些已經往生了？謝教授也讓我有些想法，我之前在高雄服務四年，去年調回台東，剛好我們鄉公所有個計畫，因為現在少棒館也是在紅葉國小校地，學校也希望能把少棒館獨立出來。剛好公所有個計畫，就是，我們部落要蓋一個多功能活動中心，希望把少棒館拉出來，剛好謝教授來我也跟他談這個議題。我說如果可以的話，透過兩次工作坊，我們去看一下少棒館裡面這些展示，或者它所呈現的這些議題，可以怎麼重新做一個論述。因為進少棒館之後出來心情是不好的，裡面看到幾乎都是描寫一些球員悲慘的經驗，所以我也在思考說紅葉少棒重新做論述的話，就像今天的題目一樣，這些小孩子包含我父親六十五歲了，他們永遠被鎖住在 1968 年。

當然從我訪談我也有發現有些轉變，好像我父親之前非常反對，以前都會有些記者莫名其妙上來，我爸就不開心直接走人。以前只要有電話，我爸會叫我過濾，他不太願意講這一塊，一方面是老人家不知道怎麼去論述，就像剛剛老師講的要先跟歷史和解。為什麼這些冒名頂替的事情？這些小學員十來歲根本不清楚發現這些事，你現在反過來問他說你當初為什麼冒名打球，身為當事人包含我父親他們情何以堪？就說他們年紀那麼小，我們都打過棒球，先發名單都不是球員決定的，你過了十幾二十年訪問那些球員你們以前為什麼要冒名頂替打球，那他們要怎麼回應？他們現在應該也看開了，到人生最後的階段了，也比較可以對這一塊願意去談。加上台東這幾年辦了相關紅葉盃，每年暑假，算國內大的棒球賽事，我父親他們也會受邀，不管是不是形式上，對紅葉少棒的再現還是如何，至少我父親那些長輩對這一塊沒有像以前那麼排斥。所以我現在想要做的就是說，跟謝教授他們團隊再把紅葉這個部分重新整理跟論述，我先前的一些資料已經十年了，相信再訪問這些球員，他們應該也會有不同感受跟理解。好，謝謝。

吳誠文：謝謝邱老師。經過兩位的說明，在座有沒有來賓，想要提出你的見解看法或者是想提出這個問題的。利用這個機會，紅葉少棒這段歷史，慢慢從不同角度去看的時候就會越來越清楚。當年這些球員那時候還是小朋友，有國外的球隊要來訪問，希望派一個最強的球隊去應戰，就會交代到縣政府、教育局、學校來，要派出一個球隊等等。教練就開始選球員，既然要打贏，一定要挑現在狀況最好，有些已經畢業了怎麼辦呢？當然不是小朋友他自己要報名參加的事情。我們也知道這個媒體的記者幾十年都一樣，問問題的方式沒有改變，白目的問題很多。但是回顧這段歷史，假使沒有那種炒作的話，台灣的少棒也不會受到重視，但炒作時間長了以後，型態要有所改變。台灣這十幾年棒

球的發展一直到今天，那時候的棒球、少棒的熱潮，造成全台灣非常多的國小都組棒球隊，可是到今天反而球隊比以前少很多，沒有辦法用那種方式政府每年編很多預算支撐的方式維持下去，也就是說台灣各個單項運動的推廣都還是停留在四五十年前，政府沒有預算就不會組隊。

到今天職棒的選手，大家可以看到，超過一半是我們原住民的好手，棒球的重點學校也不是只有在東部而已，大部分是在西部比較大的這個城市。所以要打球的小朋友到中學，這些好手都得離鄉背井，要到異地去參加棒球重點學校才有辦法打球，所以他不是一個正常的、很普遍地、遍地開花的發展方式。政府每一年都在講基層運動的事，但卻沿用先前的方式，例如上屆的奧運有一大堆單項協會出問題，逼得要修改我們的體育基本法，把這個單項協會重整。可是事件過後以後，現在狀況還是一樣，雖然協會的選舉辦法有一些修正，但因為政府還是想要掌控國家代表隊的行程，不想讓民間自主。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國家代表隊的競賽得獎有 K P I，所以歷任的教育部長、體育署署長或者是以前是體總會主委，只在乎得到多少獎牌，因為這是他的政績、績效，要對立法院交代。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我最近在審閱運動科技產業的事，發現有個學校叫史丹佛大學，是大家都知道的學術頂尖學校。矽谷就是在舊金山灣區，發源也是從史丹佛大學，他的學生跟畢業生創業連帶影響，到現在為止是全世界創業最頂尖的基地。大家都知道史丹佛對產業、學術的貢獻，可是很少人知道史丹佛這學校在美國的運動是頂尖的。他在上屆的里約奧運，光是史丹佛的學生剛畢業的校友就幫美國拿到了三十面的獎牌，一個學校其中有十五面是金牌，台灣我們要拿到一個金牌都非常困難。但他是學校而且沒有體育系，這些選手全部都是有自己的專長，雖然花很多時間在運動，但是這些選手都可以在六年內拿到他的學位。他很想運動上面，在全世界最高的舞台去得獎，所以他會做一些犧牲，可是他們也是聰明的學生，在他的專業領域裡面一樣可以拿到學位。這樣把運動變成是文化的一部分，他們從小接觸運動，是興趣喜歡，不會跟學業專業領域區分開來。

全世界有兩種培養這種選手的機制，一個就是極權國家的機制，把選手集中，你一直做這件事情，從小運動，幫國家爭取榮譽、獎牌，極權國家中國、古巴、俄羅斯，就是類似這種方式，國家會養你一輩子。自由民主的國家不可能這樣，因為這不是政府該做的事情，所以在美國沒有任何一個運動不能職業化的，運動項目都是用民間的力量，他們叫 club。像是職棒就是 ball club，台灣叫球團，可是在美國叫 ball club，要花錢加入的。所以從小美國的少棒都是家長要花錢讓小孩子進到 club，他們所謂地方聯盟都是 ball club，組起來的聯盟，全部都是家長付出，不是政府有給錢才會組隊。所以我們台灣進到已開發

國家的時候，政府要思考把相關法令設計好，地方的設計開發加入運動設施、球場，只要社區發展條例修改，就可以引導這個社區發展。美國的作法就是這樣子，政府也不用花錢，開發就都是民間在開發，加進去以後，然後 ball club 設立，大家普遍地都可以打球。商業行為也可以進來，不要說跟運動結合不好，其實他是好的，大家有生意可以做，好的球員就有球可以打。你加入 ball club，打到一定程度就變成職業選手，職業選手你在這裡就是賺錢不是花錢。當你不是職業選手的時候你是要花錢的，在學習過程，你是學徒是要花錢去學的，像是餐旅學校也是，當然運動也是一樣。這種機制是自由民主國家的機制，那些頂尖運動員在美國他們是花錢，可是當你變成非常頂尖之後，學校會給你非常豐厚的獎學金，你變成是賺錢，你可能畢業從學校出去之後就是職業選手。

史丹佛裡面有一個是美國全國排名第一的四分衛，他是建築工程畢業的，四年就拿到學位的。他現在還在美國打 NFL，是頂尖的四分衛，他到 NFL 還組了一個讀書會，教那些打球的人要唸書，他即使受傷離開也不必擔心他下半輩子怎麼樣。所以我們在台灣的發展我希望政府要朝著這個的方向走，我們把紅葉過去的歷史跟我們整整已經有五十年的少棒的發展檢視一下，或看看成大如何結合我們各校的學程，協助政府的運動政策。從歷史的檢視，去形成運動發展結合文化這種政策的制定提出一些論述的話，讓政府的施政可以慢慢地走向正常的管道，因為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不是極權國家，政府要管這種單項協會越來越困難。大家反彈越來越大，政府的花費就越來越多，體育署的經費每年要一直不斷地編，衝突也會越來越多。如果能夠改變的話，對台灣都是好的，也非常感謝兩位起的這個頭。林教授有沒有什麼觀點可以跟我們分享？

林寶安：其實我很好奇，我對這個領域是完全陌生，不像是謝老師鑽研在這個領域很久，非常關心，剛剛聽到整個歷史，雖然我年紀也夠大到對少棒、青棒瘋狂。我比較好奇邱老師後來有提到，謝老師好像後續有一些針對這部份的規劃，剛聽到這個過程，大概可以感受到，當初的這支球隊的這樣生命歷程這幾年受到很多的關注跟討論，對於整個過去這種生命史的生命紀錄，未來在紅葉這邊有些規劃，是不是也藉這個機會讓大家可以比較清楚？這是一個重新去面對我們台灣在後來，特別是戰後這段發展兼歷史裡面，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謝謝。

謝仕淵：剛剛林老師的問題我大概這樣回應，其實我是在邱老師的論文裡面看到他訪談那時候的參與者，我現在是沿著這樣。因為十幾年的訪問，邱老師那個時候只有一個人做，我們是希望能夠把成大的師生結合，台東女中有幾個很熱心的，也是我們學校畢業的歷史老師還有公民老師，一起來做一個比較廣泛部落的觀點的紅葉少棒的訪談。譬如說我們昨天跟邱老師訪談你的父親的哥

哥、你的阿伯，或者是約當同年齡、下一輩的人，對於紅葉村而言，到底紅葉是什麼？這件事我們要先把他確認清楚。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個有形的文化資產，因為紅葉少棒館它就是一個陳列館，它已經失去能夠維持這些文物完好的功能了。東西、物件放在那邊，就是等著它們一天一天生命的結束。我們希望能夠把那個狀態維持下來，以那些物件開展背後的研究跟訪談。當然，要先從整個紅葉紀念館現在的觀點是什麼，再從這些素材當中去找出一個新的說法，這是我大概的計畫，今年修研究所的課的學生跟大學部的一些同學會一起做這件事，大概是這樣回應林老師。

邱聖德：我這邊補充。其實那個有些朋友說，如果紅葉少棒要走出來，就把國族主義民族英雄解構、解開，不要再讓這些球員背負歷史重擔，一方是正面評價，一方面又是一堆對他們過去負面的部分。可是有時候歷史就是這樣，它已經形成了，像如果你有機會到延平，很難不發現跟紅葉有關的標誌，包含道路、學校單位，還有我們延平鄉的鄉徽、入口意象就是紅葉少棒，入口意象進去都是紅葉少棒。所以要讓我們父親走出來就是要解構，可是我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這些東西不是很簡單的。我們都希望讓我父親那一代有一個出口、解套，對於這個事情因為現在資料都有也沒辦法去否認，雖然當事人已經不在，還好我當時還有訪問到當時的管理。所以成大這邊的團隊除了做田野部分，也希望可以幫紅葉少棒做轉型，而不是在我們村莊一個打卡地標，然後跟我們部落沒有連結。我們自己部落進去的次數也不會比外面觀光客多，幾乎沒有人會進去，我們都是到旁邊的雜貨店，包含我自己弟弟在紅葉國小服務，我也不知道國小有沒有做相關的過程。國小有棒球隊，但這些人了解少棒館為什麼蓋在學校旁邊嗎？

剛剛副校長也提到棒球隊，其實棒球的議題很多，像現在紅葉國小的棒球隊，沒有一位是我們在地的球員，全部都是鄰近鄉鎮阿美族的小朋友。為什麼不讓孩子打棒球，除了少子化跟人口外移，在地紅葉後代為什麼不投入棒球？不像早期一個學校就有兩個棒球隊的那個盛況。過了幾十年整個少棒沒落，再來就提出棒球體育班的設置，每年都會提這樣的討論，但是我們的棒球就是永遠就是把小朋友集中在一起。沒辦法，因為你要有成績，教育部才會多撥一點經費，沒有錢，我們的小朋友當然都去外縣市打球，包含以前的善化、現在的古堡，幾乎都是東部球員，常常會出現，明明是東部跟北部比賽，結果對手都是親戚，都是表哥、表弟、堂弟。

除了我們一般從國族認同之外，我希望可以把紅葉少棒紀念館裡面的文物重新整理。我曾經去過裡面，有些遊覽車、團體導遊的導覽都是亂講的，我沒有揭穿他，他們不知道旁邊有位是紅葉少棒的第二代，我也沒有去戳破，但會覺得

說我們少棒變成是一個死的東西在裡面。我曾經跟公所反應，是不是應該要有導覽的部分？到一個少棒館理面，你出來應該要了解應該什麼，不是紀念品買一買、打卡拍照就走了。希望透過這次公所的整建，再做些資料完整搜集，以後大家來紅葉少棒館，是開心地進去跟出來，不要被鎖在那段歷史裡面，謝謝。

吳誠文：有沒有問題要提出？

觀眾：想問一下對你們來講，打棒球的意義是什麼？你有打棒球跟沒有打棒球的話，別人在看你的時候，會說你有打棒球怎樣？

吳誠文：當年這種少棒的風潮，是從紅葉、金龍、七虎，我是他們三年之後進來。小朋友打球就只是好玩，在十歲到十二歲之間那個年齡，沒有一個小朋友會去考慮後面的事情，就是好玩喜歡打，這是很正常的。運動本來就是人的基需求，應該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在小學唸書的時候，在博愛國小，離這邊不遠，我是第五屆畢業生。我在班上那時候五年級加入球隊開始，就變成一個很特殊的人。老師也會說你去比賽請公假沒關係、為校爭光，如果比賽，報紙就會報，校長就會很高興，所以變成比較不正常的方式在發展。我們拿冠軍不管是學校、到台南市、到南區、到全國等等，都會被當作是英雄。在美國比賽的時候，大家看得相當緊張，我們自己就比賽，小朋友打球也不會背多大的責任。

當然慢慢長大以後，我在打校隊，打球可能就不太一樣。職棒是為了他的飯碗，那個壓力更大，因為是怕被炒魷魚。我很認同邱老師跟謝老師他們講的，重新檢視這個歷史的時候，總是要有些想法，未來的發展要做些改變，我們要去觀察紅葉這個事情，責任到底在誰？責任不是在個人，如果有些負面的檢討的話，責任就是那個時代、系統、體制產生的一些問題。這個問題是所有人共同要去承擔的，不能再去怪當事人，包括教練、領隊、校長等等。那些歷史讓它過去，但要記得紅葉造成的現象是政府重視棒球，那是紅葉對社會最大的貢獻，當年政府其實不是很注重棒球的，跟從日本時代的狀況不太一樣。讓政府重新重視棒球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但是之後的發展、用的方法對不對是另一個要去檢討的事情。

台灣進到民主自由的國家，政府不能不去看怎麼樣改變這件事。當我們重新回到紅葉村、紅葉國小，要把這件事情做個修正的時候，紀念館怎麼蓋才能不要再背負一個原罪，應該要把它當做是正面的表徵。告訴大家，不要再叫紅葉再重振當年雄風，這個沒有意義的，一個有天份的棒球選手是可能會出生在任何地方，他不會永遠出生在紅葉村。這是一個讓台灣也許重新檢視我們棒球運動

的發展要比較正常化的一些啟示。紅葉國小方面的話，政府不管是在都會區還是偏鄉，都要好好投資教育，不要只照顧所謂學業菁英的份子。任何一個地方的教育好好投資，讓這個地方的小朋友長大以後，不可能全村都要打棒球，他們一定要生活，在這個社會上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貢獻，延續他們的價值，這才是我們去感念紅葉少棒隊的貢獻的方式，而非繼續投錢，那些錢也不夠，也不是所有紅葉村的小朋友都是適合打棒球。如果偏鄉教育普及、運動設施發展，運動才能變成在文化裡面，各行各業都能夠蓬勃發展，這才是好的方式。也很感謝各位這個蒞臨，我想邱老師跟謝教授將來在紅葉少棒這個議題上，能夠繼續讓國人從比較正確的角度去描述這個事實。還是要肯定紅葉少棒的貢獻，但不是服務國家的這種角度，小朋友不會去服務國家，他們只是喜歡運動而已。我們從這個角度去來檢視這個歷史，也許紀念館的陳設描述就會不一樣。非常感謝兩位與談人以及我們所有的來賓，謝謝大家。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